激情和理智的貌合神离
——以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为关节点

赵 敦 华

(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　要: 利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材料,从罗素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大致可以划分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的理性服从激情。罗素 1920—1921 年访华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反映出他的中期思想特征。

关键词: 理论激情;维特根斯坦;瑞·蒙克;数学哲学;知识论

中图分类号: B 561. 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2-0076-08

一、罗素来华对其思想和人生的影响

2020 年 10 月是罗素来华一百年的日子。最近十多年,中国先后出版了三本相关文集:《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是罗素的讲演和在北大讲课的记录,《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收录了罗素来华期间的新闻报道,《中国问题》是罗素 1922 年在英国出版的论文集中译本。

第一本书编者姜继为在题为“勉为其难的‘先知’”的“前言”中写道,“多数人听罗素的哲学讲演其实是在挺热闹”“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罗素的哲学讲演实在是超前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接纳,主客双方落差较大——当然,大概在十年以后,罗素哲学在中国开花结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洪谦、张申府等人开展了以逻辑分析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傅种孙、沈有鼎、王宪钧、胡世华等人开展了数理逻辑的研究和教学”。① 朱学勤在第二本书题为“让人为难的罗素”的“代序”中说:“让人为难”之处在于:“罗素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面面相觑,亦觉尴尬。随后,对他影响力之大小,就发生了一场争论”,“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的,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还是一种双重失望。”②和这个评价不同,童世骏在第三本书“序一”中说:“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包括在 1965 年的重印本序言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赞美,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期待”;储殷在“序二”中说:“一百年前的罗素,正是本着人类共同体的信念,才能给中国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或许是罗素访华对今日而言,最重要的价值。”③

今天人们没有兴趣重复这些不同声音或重启争议,本文也不想这样做。我愿意首先指出,上述引用的三种评价是从不同角度说的:姜继为从哲学角度评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朱学勤从五四时期的“主义之争”看待罗素中国之行引起的失望,童世骏等人从中西交流的角度赞扬《中国问题》这本书的价值。按理说,这三种不同角度的评价没有矛盾,我们大可不必争论。那么,今天的纪念,还有什么新话可说

收稿日期: 2021-01-08

作者简介: 赵敦华,男,江苏南通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名称:西方哲学经典和名著解读”(项目编号:19JJD720001)。

①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版,第 5 页。

②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

③ 罗素:《中国问题》,田瑞雪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 版,第 v、x 页。

吗?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纪念一个历史事件,最好的方式是理解它的意义。罗素来华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罗素来华对中国的意义而言,见仁见智,无须得到一个统一结论,但是,就罗素来华对他本人的意义而言,现在已有充分资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罗素其人其哲学。

德国唯心论者费希特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①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也说,一个人的气质决定他的哲学,不同的气质造成比较重情感或比较冷峻的宇宙观。②英国哲学的先驱者休谟有句名言:“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激情和为激情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③(“激情”passion, 原书译作“情感”)。休谟所说的这条人类心理学的通则,似乎不适用于哲学家。不要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倡导用理性控制激情,就连休谟自己和他同时代的卢梭,也用冷峻、细腻的理性来剖析激情的利弊。至于 20 世纪那些被称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在激情、欲望与理智关系的问题上,不是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法,就是理论和行为不一致。然而,罗素是一个例外,罗素是个性极为鲜明的哲学家,才华横溢,自由无羁,敢说敢当,既有卓尔不凡的理性,也有不可遏制的激情,而且,罗素对自己的理性和激情更有深刻的反省,他的反省与理性和激情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把罗素当作一个典型,具体分析一个哲学家是如何自觉对待自己的理性和激情的。罗素的性格和行为极为复杂,在人生不同阶段,随着环境和思想的变化,他的理性与激情结合的方式也不断变化。

三十多年前,我在关于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的博士论文里,同步地把他俩的哲学分为早中晚三期加以分析比较,博士论文按纯哲学标准写作,没有使用生活传记材料作为依据。毕业以后看到瑞·蒙克(Ray Monk)写的维特根斯坦传记《天才的责任》(1990),后来又看到他写的《罗素传》(上卷 1997,下卷 1998)。蒙克的传记开创了哲学史研究的新范式,即依据哲学家人生经历来阐明他的思想变化。本文把罗素早中晚三期的思想变化与蒙克的传记材料联系起来,从他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阐述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理性服从激情。瑞·蒙克的《罗素传》被公认为最详细的罗素传记,其上卷题目《孤独的精神(The Spirit of Solitude:1872-1921》,下卷《疯狂的幽灵(The Ghost of Madness):1921-1970》,大致概括出罗素一生的精神特征。在我对罗素思想的分期中,早期和中期罗素处于蒙克上卷描述的时期。罗素来华 9 个月(1920 年 10 月 12 日—1921 年 7 月 10 日)只是他漫长生涯的一个片段。蒙克的《罗素传》共 1400 多页,其中记述中国之行 15 页(上卷第 698—712 页)。时间虽短,却是他的人生道路转折的一个关节点,因为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

二、罗素早期的理论激情

罗素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中说,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是两次浪潮,“第一次是在第一次大战之前,第二次是大战一完他就把他的《逻辑哲学论》寄给了我”④。这两次浪潮的后果,不仅是思想观点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的改变。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的传记材料。

1912 年春季学期,维特根斯坦来向罗素学数理逻辑,在课堂和课后讨论中,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发现他的理论热情,看到他早期与怀特海合作《数学原理》(第一卷)和写作《论指谓》等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经典倾注极大热情和才智,他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已经给世人带来了大量的抽象思想……

---

① 参阅北京大学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330 页。

② 詹姆士:《实用主义》,陈羽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7 页。

③ 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53 页。

④ 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0 页。

令其至关重要的,令其富有成效的,正是我投入的绝对的没有约束的巨大激情。正是激情厘清了我的思维,正是激情让我从未停止追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值得去做,正是激情让我不去考虑是否有人会去看它,正是激情让我可以伏案数年,面对一张白纸,一直思考一个可能无关紧要但是我无法得到正确答案的问题。”在罗素看来,“激情”不是“无情”的反义词,相反,这两个词汇几乎是同义的,“就给予人冷静的睿智之见而言,没有什么可以与激情相提并论”。哲学的理性必须具有激情,“哲学是一位踟蹰的情人,只有用激情之手握着冰冷的剑,才能打动她的内心”,罗素在给情人的信中这样说。①

罗素在维特根斯坦身上看到自己的镜像,把他视为“我心目中解决问题的理想人选”。②罗素在《数学原理》(第一卷)的基础上继续写作第二、三卷,计划创建一个数理哲学学派,而“维特根斯坦却说服了我,《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欠缺精确性,不过值得庆幸的事,纠正它们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而不是我的肩上”。③《数学原理》前几个部分的精确性不是细节问题,包含了全书的理论基础,维特根斯坦的“纠正”实际上要推倒重来。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将解决我这把年岁的人无法解决的问题”④,他把数理逻辑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维特根斯坦身上。

罗素另辟蹊径,投入对知识论的研究。1913 年 5 月,罗素撰写一本自认为“完成之后将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包括三篇,第一篇“论亲知的性质”,把殊相、共相、关系、谓词的逻辑形式统统归于亲知的客体,第二篇“原子命题思想”使用《数学原理》和《哲学问题》中的“多元关系”提出一种判断理论,就是说,命题被分析成它的亲知客体,比如,“苏格拉底喜欢柏拉图”这个命题的前提是亲知“苏格拉底”“喜欢”“柏拉图”。罗素以每天 10 页的速度完成了这两篇。⑤

维特根斯坦的来访给了他的理论以致命打击。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殊相、共相、关系和特性,不存在个体和形式,客体与形式不可分割,他劝罗素放弃《数学原理》中的类型理论,用不同的符号代替不同类的客体。针对罗素的判断理论,维特根斯坦说,从“A 判断 a 与 b 有关系”这个命题,直接得知命题 aRb v~aRb,根本无须使用任何别的前提。“你的理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分歧关系到逻辑学的性质和对象的根本问题。罗素把逻辑学界定为“对复杂命题的形式研究”,而形式是一类客体,逻辑研究从对客体的亲知开始,然后根据不同类客体的亲知,形成判断。维特根斯坦却认为,不存在客体,逻辑分析直接从命题开始;逻辑形式不是逻辑客体,而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不是判断的内容。他说:“恰当的判断论必须让人不可能判断无意义的话……罗素提出的理论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⑥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从根本上摧毁罗素从事逻辑和哲学的努力。他在信中吐露心迹:“维特根斯坦对我的研究进行攻击,这是我最近犯下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所在……我本来计划撰写的这本著作的一个很大部分,无法继续下去,也许数年之中都无法进行,所以我很难诚实地面对它……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在研究中出现不够诚实的状况……昨天,我产生了自杀念头……最近,我厌倦人生;一般说来,这是一种迹象,显示我没有认识到的罪孽。”⑦罗素的理论激情受到挫折,于是把激情转向政治。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积极发起反战运动,发表猛烈抨击英国政府征兵法的文章和传单,被判处拘禁 6 个月。罗素享受监狱的一等待遇,把牢房改变成藏书丰富的书房,他说:“这里的生活就像在一艘远洋

---

①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10 页。

②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298 页。

③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342 页。

④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298 页。

⑤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348、349 页。

⑥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338、354 页。

⑦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355 页。

船上,唯一去处是自己的高级包房”。① 罗素在狱中恢复了平静的哲学研究,写了《数理逻辑引论》,酝酿《心的分析》这本书的写作。罗素刑满释放之后,恢复了在剑桥三一学院的教职,重归哲学界,忙于写作和讲演。虽然罗素理论激情开始减弱,原创性研究不够,但他依然充满哲学研究的信心和精力,保持着早期的精神状态。

三、从早期到中期转变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罗素收到尚未从意大利战俘营释放的维特根斯坦转来的《逻辑哲学论》手稿。维特根斯坦告诉罗素,这本书“终于解决了我们当初所谈的问题”。1919 年 12 月,两人在海牙重逢,罗素说:“维特根斯坦一如既往,一点也没有改变,他满脑子里全是逻辑学,喋喋不休地说了 4 个小时”。② 在 7 天时间里,罗素弄懂了《逻辑哲学论》,但两人的分歧不能弥合。罗素区分了逻辑学、认识论和心理学三个不同领域。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逻辑命题都是同义反复,意义的心理学部分不是逻辑学家关注的因素;他还认为,逻辑真理与伦理学、美学和宗教这三种真理是一回事,神秘主义和逻辑学是一样的东西。而罗素认为,这种神秘主义不过是受误导的思想失败而已。③

虽然罗素无法接受《逻辑哲学论》的观点,但《逻辑哲学论》给他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在此之前,罗素对逻辑学的性质带有柏拉图主义特征,而《逻辑哲学论》却说逻辑学纯粹与语言相关,逻辑真理仅仅是同义反复。蒙克评论说:“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显得相当深奥难解,然而它对罗素的人生影响巨大,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罗素过去追求的目标是证明数学的基础是逻辑,逻辑是具有绝对确定性的真理体系,如果逻辑学不提供这样的实在真理,那么激发罗素研究数学哲学的逻辑思想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他追求绝对确定知识的激情只是一个梦想。“从根本上说,这是罗素放弃数学的原因。”罗素的思想和人生步入我称之为中期的新阶段。

从早期到中期的转变有近两年的过程。蒙克《罗素传》用题为“自由之路”的第 20 章描写罗素转变过程,包括(1)哲学(2)朵拉(3)俄国(4)中国等四节。“哲学”这一节写维特根斯坦影响罗素的“第二次浪潮”,如上所述。

从 1919 年 6 月开始,罗素与 25 岁的朵拉·布莱克相恋,朵拉是激进的反战分子和社会主义者,与罗素志同道合,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结婚生子,这让一直盼望有合法子女的 49 岁的罗素为之入迷。罗素与原配妻子爱丽丝早已分居,但办离婚的法律手续至少需要一年。在此期间,罗素和朵拉以情人相处,准备结婚生子。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罗素在报刊发表几篇文章,他声称:“我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在这场战争影响之下,以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唯一的方法是对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造”,“布尔什维克分子强调这一点的做法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民主是一种花招,诱导受害者对自己的谴责”;“布尔什维克——无论我们对其优缺点持何种态度——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成功国家中加以实施”,“布尔什维克对世界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超过了雅各宾派在法国取得的胜利;我相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应该支持布尔什维克,都应该与他们合作”。罗素承认:“理性和激情在我身上进行着殊死搏斗,让我没有能力采取任何行动。我知道,离开了斗争,离开了铁腕、组织和纪律,就不可能获得美好的东西。我知道,为了采取集体行动,必须将个人变成机器。”④

由于这些文章,罗素被英国政府视为苏联问题专家,1919 年工党政府组织访问苏联代表团,邀请罗

---

①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624 页。

②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671 页。

③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677、672 页。

④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681、682、683 页。

素作为官方代表,与工团主义代表共同组团。代表团于 5—6 月访问苏联,参观彼得格勒、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受到待遇豪华和隆重接待,但不能接触民众。罗素通过敏锐观察和与几个自由知识分子私下交谈,觉得苏联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妙。罗素获准与列宁会见 1 小时,列宁毫不客气否定了罗素自以为是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用行会社会主义避免独裁,英国工党的议会民主,不用暴力来实现社会主义,农民的自由贸易。列宁说,无论西方是否取消对苏联的禁运,布尔什维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都是不可靠的;在国内,必须对农民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访苏经历使罗素对布尔什维克产生幻灭感。回到英国,他把在《国家》和《新共和》两本杂志上发表的两个系列文章合集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出版,表达了这样的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布尔什维克开具的药方比它要医治的疾病更糟糕。他要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暴力与和平、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亚洲与西方中间,找一条中间道路。

正在此时,1920 年 6 月底,罗素看到来自北京的中国讲学社的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访问讲师,为期 1 年。罗素欣然接受邀请。如果考虑到他正处在人生道路转折的关头,去中国讲学一举三得。其一,在哲学上,罗素正在逐渐恢复由于维特根斯坦攻击而失去的“理论热情”,但他在英国作的新哲学讲演,并没有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他到中国讲哲学,听众对他这位“世界最重要哲学家”的欢呼,可以大大增强他研究哲学的自信心。其二,在政治上,在中国这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罗素鼓吹中间道路,可以赢得信徒。其三,对个人生活而言,罗素和朵拉同行,可以避免在英国离婚缓冲期对公开同居的约束,便于回国后结婚生子。

罗素和朵拉于 9 月 6 日起航,经过 5 周,于 10 月 12 日抵达上海,一下船“就像国王和王后”一样受到款待,在第二天上海各界举行欢迎宴会上,罗素告诫中国人不要引进欧洲追求物质文明的错误经验,重蹈欧洲覆辙,而应重视中国文学艺术的固有文明的价值,注意保存,他愿把自己改造欧洲社会的原理,贡献给中国。宴会主持人致辞欢迎罗素先生和罗素夫人,希望罗素学说继孔子而风行我国。①

几天以后,周作人发表文章,批评罗素第一场演说就“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士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他写道:“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就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的。我们欢迎罗素的社会改造的意见,这是我们对他的唯一的要求。”②

张申府随即纠正国人对罗素的两个误解。其一,“保存国粹”只是国人联想。并非罗素讲演本意。其二,布莱克小姐不是罗素夫人。张申府转述罗素致上海报馆的信说:除了法律认可外,罗素与布莱克小姐与夫妇无异,而英国婚姻法律“腐旧不适用”,有识之士当废弃之。③罗素申明他和朵拉是事实上夫妇,堂而皇之否认了英国法庭认定罗素与朵拉的“私通”关系。借张申府的澄清,罗素还避免了他是否提倡国学的争论。

罗素是聪明绝顶之人,立刻领会到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是他的社会改造论。他在上海的第一讲是“社会改造原理”,鼓吹在俄国和西方之间选择“最好由同业工会的组织自谋发展”的经济制度。④几天之后在南京讲“教育之效用”,鼓吹“唯教育为中国之急务”,“教育应注重社会不应专重个人”。⑤接着游览杭州,沿江而上经武汉到达长沙,发表“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的讲演。罗素迎合中国听众中大多相信布尔什维克式社会改革的心理,只讲他在访俄之前而不是之后发表的观点,“若要来实行共产主义,也

---

①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14—15 页。
②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19 页。
③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21 页。
④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版,第 2 页。
⑤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 3—4 页。

许大家都要受点损失。不过物质上受了损失,在精神上却得了好处……为着将来的社会的福利和发展及人类精神,都有莫大的利益,还是实行共产主义才好!”①当然,罗素不忘鼓吹用和平方式改变社会。听众中 26 岁的毛泽东写道:“本人反对罗素的观点,我的态度可用寥寥数语概括出来,他的说法和理论相当不错,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做到。”②

四、从北大讲课笔记看罗素中期思想

1920 年 10 月 31 日,罗素到了北京,开始在北大讲授哲学课程,课名是他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书名,用的是他在美国和英国多次使用的公共讲演稿。如他所说,到北京去是讲哲学的,但是哲学讲义,他已经预备好了,不必再要他劳神,所以这几个月里,他预备一面讲哲学,一面去研究社会事情。③从 11 月初到次年 3 月初,罗素在位于红楼的北京大学三院,讲授 5 门课,工作量满满。罗素讲课由赵元任翻译,中文记录在《北大日报》《罗素月刊》及时发表。现在无法与罗素英文讲稿对照,但从罗素发表的英文著作判断,赵元任的口译准确无误,现在出版的罗素在北大讲课的“五大讲演”是理解罗素思想的可信历史资料。

与罗素同时访华的杜威向中国公众隆重推荐罗素这位“现代三大哲学家”之一,他说:“詹姆森和柏格森底哲学,都从心理学下手,注重人事一方面……而罗素则从最近法式(指皮亚诺、康托尔——本文作者注)最抽象的数学下手,他不信心理学,以为心理学与哲学无关。”④杜威对罗素哲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十年前。从罗素在北大讲哲学的课堂笔记看,此时的罗素离开了数学和逻辑学的抽象思想,在哲学上也是从心理学下手,在政治上注重人事一方面。罗素在讲课中不时批评柏格森和詹姆森,但与两人的“心理学”哲学体系相比,罗素的“心理学”笔记显得松散凌乱,缺乏章法。盖因罗素思辨数学和逻辑学基础问题的信心,深深被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所伤害,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已经放弃了对技术哲学的研究,而是转向了心理学的判断理论和符号理论。

罗素在北大讲课的内容,比他在英美讲座或同名的书简单得多,但听众仍然听不懂,第一次听众 1500 人,以后人员渐少,北大师生组织“罗素学说研究会”,一个自称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抱怨说,“我发现罗素讨论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⑤而罗素在自传中说,讨论班上除了一人是满清皇帝的侄子,他们全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常常一个一个地悄悄溜到莫斯科去。⑥ 罗素的揶揄反映两个事实:第一,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流行;第二,罗素没有指望学生理解他的技术哲学。实际上,罗素在北大的“五大讲演”,几乎没有涉及他的技术哲学。如果概览罗素的“五大哲学讲演”的笔记,我们看到的是一点哲学史,一点当代心理学简介,一点他自己的心理哲学,如此而已。只有第五次课程“社会结构学”的 5 次笔记才是他发力的重点。

《哲学问题》十二讲,基本上重复了休谟的知识论,罗素新命名为“中立一元论”。无论物质还是意识,都是既是物质也是意识的经验材料;经验材料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分为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物理现象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反应,先有感觉的预期,后有经验的证实。总之,“很通行的先天必然关系的说法已过去了”,“无一成不变的物质和真理,我们求知识只可以从经验上造成多分比较的真理”。⑦

《心的分析》十五讲介绍了当今的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罗素自己的心理学把

①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 6 页。

②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700 页。

③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206 页。

④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29 页。

⑤ 曹元拥编:《通往自由之路——罗素在中国》,第 9 页。

⑥ 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88 页。

⑦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 67 页。

人的本能习惯分析为欲望(desire)的循环运动,这是感觉(sensation)、想象(image)、信念(belief)和情绪(emotion)的行为循环;想象是过去感觉的复制,想象的联想、直觉、记忆、内省构成经验和思想;“记忆是知识的起点”,而信念的感情是回想,它的语言内容可用“这个之存在”(existence of this)表述,“这个”(this)是记忆-想象(memory-image)的范本,“存在”(existence)表明“真实”的感情,而“之”(of)表示这个和存在的关系。罗素最后开始讲到逻辑原子论,但没有信心地说:“这个记忆的分析也许是极错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修正它。”①此课到此结束。

《物之分析》六讲与 1927 年发布的同名著作没有关系,而是 1925 年出版的《相对论 ABC》的一个简本。罗素使用了数学公式、图表甚至实物模型,讲解相对论基本原理。虽然是科普,但对当时既不懂数学也不懂科学的“文科生”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

《数理逻辑》一课也是如此,虽然是只讲一阶逻辑的基本演算规则。这门课的中文笔记可能不是赵元任翻译的,而是由记者按照黑板上的板书“仓促记了大意”。②

《社会结构学》五讲笔记传播最广,每一讲的讲稿交给日本《改造》杂志刊出。罗素回国后以这些讲稿为基础,与朵拉合著《工业文明的前景》(1923)。之所以合作,因为两人朝夕相处,时常交流,虽然两人都是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者,但对工业产业的态度不同。罗素在中国再三提醒要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学艺术,但也要适度发展产业实业;朵拉全盘否定产业的功效,她说:“我从心里仇恨金钱,仇恨战舰,仇恨工厂,仇恨不停转动的机器。这些东西泯灭我们所有的创造性本能,泯灭美好的东西,将力量交到罪恶的手中……让我们废弃工业吧,即便不得不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也在所不惜。”③大概由于朵拉的“枕边风”,罗素讲这门课充满“但是”,要发展工业,既不能采取资本主义,也不能采取共产主义;中国的实业不能交由外人,而要由国内行业工会来发展,还要警惕日本的侵略;不能过度开采资源,但也要满足国内物质需要,如此等等,面面俱到。《社会结构学》计划十讲,到第五讲时因病住院戛然中止。

离开中国时,朵拉怀有 5 个月身孕。罗素夫妇回国途中顺访日本,在东京火车站被记者追拍,朵拉一个踉跄,差点跌倒,罗素顿时火冒三丈,挥舞手杖,追逐那帮记者。罗素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产生的激情肯定与印度的英国人在哗变中的感觉不相上下,或者与受到反叛的有色人包围白人不相上下。我那时意识到,在人可以出现的欲望中,保护家人不受外族伤害的感情可能是最疯狂、最强烈的。”④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罗素的中国之行完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的道路,从激情和理性的关系看,他的理智转向为激情服务。

五、罗素后期思想的功过是非

罗素从中国返回英国之后,激情转向子女教育、政治活动,以及以收费为目的的俱乐部讲座和报刊写作。蒙克评论说:“作为数学哲学家,罗素取得了罕见的成就;作为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他炮制了大量二流文章。正如他的许多朋友确定的,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搞政治时怀着逻辑学家获得绝对明晰性的愿望,对现实政治的混乱局面极不耐烦,往往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他没有将自己作为伟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品质,应用到政治活动之中……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言辞,盲目的信条,以及虚张声势的拒绝对手意见的态度。”⑤

平心而论,罗素来华期间并非对中国哲学界没有一点贡献。一个意外收获是他找到了愿意出版维

---

①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 143 页。

② 姜继为编:《哲学盛宴:罗素在华十大讲演》,第 184 页。

③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705 页。

④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713 页。

⑤ 瑞·蒙克:《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6 页。

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商。在此之前,罗素为该书写了推荐性的前言,不料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在前言中误解了他的思想,拒绝把前言和他的书一起出版,失去了罗素的推荐,出版商也拒绝出版这本书,陷入僵局,维特根斯坦只好同意由罗素任意处置。由于罗素的热心推荐和联系,《逻辑哲学论》的德文和德—英对照本分别于 1921 年和 1922 年出版。热心于罗素哲学的张申府于 1927 年及时翻译了中文本《名理论》,这是这该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1988 年由陈启伟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素后期哲学并非毫无价值。1950 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撰写了多种多样的重要著述",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在授奖仪式上提到《西方哲学史》《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界限》《怀疑论文集》,认为"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罗素让自己的著作面对为数众多的非专业人士,在此过程中,他取得了卓越成就,保持了公众对普通哲学的兴趣"①。但在专业哲学家中间,罗素的后期哲学著作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维特根斯坦私下的批评尤其激烈,他认为罗素在哲学上已经自杀了,罗素的著作分成两部分:数理逻辑部分是每个学哲学的人必读的,而政治和伦理学部分,应放在禁书之列,维特根斯坦尤其厌恶罗素的《论婚姻》,说它起到春药的作用。② 这个评价过于苛刻,如果说罗素从婚姻关系入手,开激进自由主义之先河,那倒是不错的。

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真可谓思想史上的奇葩:在维特根斯坦不情愿的情况下,罗素帮助他一举成名,两人后来在哲学和私人关系上却成为对头。这大概也可以从理智与激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自始至终保持着理论激情,而罗素在半途理性与激情貌合神离,最后成为激情的奴隶。

The Seeming Harmony Between Reason and Passion: Taking Bertrand Russell's Teaching Notes at Peking University as a Joint Point

Zhao Dunhua

(*Institute of Foreign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iographical materials of Bertrand Russell (罗素) and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 this paper analyzes Russell's philosophical changes from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expound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reason and passion, that is, his harmony between reason and passion in the early stage, his seeming harmony between reason and passion in the middle stage, and his obedience of reason to passion in the late stage.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Russell's visit to China from 1920 to 1921 acted upon the process of his philosophical changes from the early stage to the middle stage, and also reveals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his teaching notes at Peking University.

Key words: theoretical passion, Wittgenstein (维特根斯坦), Ray Monk (瑞·蒙克),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 epistemology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瑞·蒙克:《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严忠志、欧阳亚丽译,第 374 页。

② 转引自赵敦华:《维特根斯坦》,香港: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18 页。